

孙中山与晚清“革命党”的多维自觉^{*}

安 东 强

摘 要:“革命党”作为一个新概念及其指称的群体,都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新事物。“革命党”起初用于称呼外国政党及组织,后转用指称孙中山,甚至泛指触犯清朝统治秩序与法律的人,包括保皇党人。鉴于梁启超在海外言说革命的影响,加之1903年中国革命风潮的演进,孙中山在接受“革命党”的身份之后着重阐释与赋予中国“革命党”应有的多重政治内涵,完成了概念、意识、仪式、制度、学理、主义等方面的系统论证,实现了中国“革命党”多维度的自觉和政治价值的超越。

关键词: 孙中山; 梁启超; “革命党”; 革命

DOI: 10. 11714/jssu. sse. 202605001

“革命”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标识性概念,而又从概念实化穿透了中国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层面。关于“革命”概念及话语的探讨,学界已然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成果^①。作为一个中国固有的名词,“革命”的意涵固然有古今之变,是一个近代中外政治与文化交汇融合的新旧一体的事物。而与“革命”直接关联的“革命党”,则完全是一个外来影响的新名词与新事物。看似讨论“革命党”必然要先讨论何谓“革命”,实则晚清以来的“革命党”的历史意涵的渊源流变与身份认同的自觉,可能反而是推进理解“革命”概念演变的要素。其间的复杂历史进程长期困扰着学界的认识与理解,迄今仍有许多值得细致考察的学术问题。

顾名思义,“革命党”必然应与谈论革命或从事革命者相关联。只是所谓谈论革命或从事革命,往往都有后来追认的倒放电影式的叙述,未必能够如实反映“革命党”的发源及其自觉的历史进程。既往学界有关探讨孙中山何时言“革命”、何时将所行之事自视为“革命”、何时自认为“革命党”的分歧与争议,便是研究仍有潜在空间的真实写照。

此前的研究理路基本是从“革命”的概念去指认“革命党”,甚至将孙中山等人从反清行动伊始便指定为“革命党”。从历史时序演进而言,问题似应在于从“革命党”的自觉来考镜中国“革命”的源流。这正如沈曾植指点欧阳竟无求解“俱舍学”的理路:“君当究俱舍宗,毋究俱舍学。”^②沈曾植提出的以俱舍宗解俱舍学之法,有类于从“革命党”称呼的出现及自觉来理解近代中国“革命”意涵的变迁,这便是本文探讨晚清“革命党”如何走向自觉的学术理路。

^{*} 收稿日期:2026—06—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康、梁与保皇会海内外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21BZS011)

作者简介: 安东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①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陈建华:《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安东强:《中国“革命”意涵的古今之变》,《文博》2025年第1期。

②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页。

一、从外来事物到孙中山的指称

与“革命”一词在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沉积不同,“革命党”一词无论是概念,还是所指称的群体,都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新事物。关于“革命党”一词最早如何出现,特别是将“革命”与“党”组合为一个新名词,尚需要从编年史的理路爬梳近代中、日文献,而不能按照后来的认识整齐划一。

可以确定的是,“革命党”最初都是用来指称外国政治群体与组织的。作为概念的“革命党”在近代中国出现不晚于19世纪80年代。1886年4月,《申报》声称转引东京某报上的评论《书法国政党》,重新拟以《论法国党祸》之名评议法国大革命之后政党混乱的政治局面,称:“泰西各国,皆有政党,以致流弊不一,而法兰西殆有甚焉。法有二党:一曰立君,分为帝党,以恢复拿破仑朝为主义,又分为王党,以恢复正统王室为主义;一曰共和党,分为随命党、革命党及过激党,又另分为社会党。”评论将“革命党”作为共和党的一个党派,仍习惯置于中国王朝政治的“朋党”分野之下分析,颇有负面意义^①。需要注意的是,这则评论提示了中文的“革命党”名词有从日本转译的东学渊源,至于转译的原文尚待考索。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虽然在中、日两国的叙述语境里都有称之为“革命”的现象,如“明治维新”又称为“戊辰革命”(戊辰年),可是跟中国古代政治语境的“革命”指改朝易代完全不是一类事实^②。日本亦无一个“革命党”的群体,所以明治时代日文的“革命党”概念也是指他国之事,《大阪朝日新闻》上于1881年最早出现“革命党”名词,即指俄国的在野反对派^③。

如果说19世纪80年代,中、日语境下的“革命党”一般用来描述法国、俄国政党情形,那么十年之后,两国语境下的“革命党”便更多用来指称俄国、中国的政治人物及群体,有关中国的指向主要是走向反清运动的孙中山及其同仁。

有关中国“革命”和“革命党”的源起,恰是纠结在一起的问题。冯自由在撰写《革命逸史》诸集时,第一篇的题目就是《革命二字之由来》。他征引孙中山的早期追随者陈少白的回忆称:

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按日人初译英文Revolution为革命,但揆诸易所谓汤武革命之本义,原专指政治变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译名既定,于是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咸通称曰革命。今国人遂亦沿用之。^④

冯自由虽为同盟会的老人,但在兴中会组织乙未重阳起义时尚未追随孙中山,所撰《革命逸史》主要得自当事人的直接自述及间接传闻。若核查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的原文表述,两者略有不同,且所言略简。陈少白自称:

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我们那时,虽然不认识日文,看了几个中国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见“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耀在眼前。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张报纸以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像印在脑中。^⑤

① 《论法国党祸》,《申报》1886年4月27日,第1版。

② 《译日本人论亚细亚东部形势》,《申报》1879年5月15日,第1版。

③ 《露国各新闻的现况》,《大阪朝日新闻》1881年12月24日,第1版。

④ 《革命二字之由来》,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⑤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2页。

两者都提到在1895年广州起义后,他们船经神户买报纸所见“革命党孙逸仙”一事。不过陈少白的回忆似有问题,冯自由亦未严谨核实,后来历经安井三吉、陈德仁等学者的考订,确认为不实之语。他们专门找到1895年的《神户又新日报》,证实当时报纸上虽记载了孙中山的事迹,可是对孙中山的称呼为“广东暴徒巨魁”^①,通篇并无“革命党”之语。因此,若严格而言,中国“革命党”称呼的出现要更晚一些。也就是说,孙中山等人在1895年举事失败之后,还没有被时人称呼为“革命党”。

历史人物的回忆固然有时空错乱和记忆叠加的成分,时空因素往往出现讹误,经不起学者的考订,但是也不应一并全盘否定。如陈少白回忆中提到的两个认知层面的问题:其一,孙中山和他“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便涉及他们观念中关于“革命”意涵的古今之变,按照后来的革命观念来看,他们的反清活动只能说是革命行动的自觉^②;其二,孙中山被称为“革命党”,是来自日本报界方面的称呼,是一种来自他者的指称。而孙中山是接受了日本人给予的政治称呼后才形成身份上的自觉,将自己定位为“革命党”,将反清的运动视为“革命”。

这两个问题在历史事实方面可以得到印证,只是时间并不在1895年,而是在1897—1898年间。根据笔者目前寓目文献显示,日本政界开始以“革命党”称呼孙中山,应当始于1897年。孙中山在1896年伦敦蒙难之后,很快便于1897年初以英文出版了*Kidnapped in London*(《伦敦蒙难记》)一书,其中采用“革新运动”(the reform movement)^③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活动,既没有用revolution的名词,也没有以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party自况。他后来解释称,因为该书以英文写作,受众对象是英国人,“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世有约翰牛之称,其宪法号称不流血的和平宪法。若与之谈急激之革命手段,彼国人必不乐闻,故不得不从权以此立言”^④。可是《伦敦蒙难记》所附录的1896年12月3日香港《德臣西报》报道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时,用了revolutionist^⑤。

由于孙中山伦敦蒙难的事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不仅英语国家注意到此事,日本政界及中国维新志士也对孙中山有了新的认识。日本政界率先以“革命党”一词来称呼孙中山。1897年6月21日,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建议欲往中国调查的宫崎滔天(原名宫崎寅藏,又名白浪滔天)联络孙中山一派,其在信中称:“以外行人论之,愚意以为投入革命党中,不久即能熟悉其语言,故当下决心投身其间,不知尊意以为如何?”^⑥这是较早所见日本政界以“革命党”称呼孙中山的记载。

宫崎滔天接受了犬养毅的建议,不久便与孙中山取得联络,并在日本见面和笔谈。现存的宫崎滔天与孙中山的历次笔谈文本,并没有标明日期,他们谈到了许多具体行事计划,其中并未见“革命”及“革命党”之语。几年后(1902年),宫崎滔天出版的《三十三年之梦》一书,在回忆中将初次相见时的孙中山称为“革命党”^⑦。这自然不能作为严谨的史料证据,需要另外寻找他在1897年与孙中山会见的史料。

正如上文所述,在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之后,上海的维新志士如汪康年等人也再次关注到孙中山,不仅在他主持的《时务报》上报了孙中山伦敦蒙难的事件,而且试图寻找与孙中山接洽的渠道。或是受汪康年等人委托,宗方小太郎赴日本代为接触,他与宫崎滔天取得了联系。

①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0页。

② 史扶邻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见[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页。

③ Sun Yat Sen, *Kidnapped in London*, 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2册,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76页。

④ 《孙总理修正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恭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2页。

⑤ 黄宇和核对当日的《德臣西报》,却并无这篇报道,可能为同党所造,陈建华认为可能是陈少白。陈建华:《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第42—43页。

⑥ [日]近藤秀树编,禹昌夏译:《宫崎滔天年谱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5页。

⑦ [日]宫崎滔天著,林启彦译:《三十三年之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4—117页。

可以确认的是,宗方小太郎起初便以“革命党”称呼孙中山,或是来自犬养毅、宫崎滔天的影响。1897年11月,官方小太郎的日记称:“宫崎寅藏信到,孙逸仙已抵宫崎之寓,请予来游。孙乃清国革命党南方之首领,曾拟于广东举兵,事败逃亡英国者也。”随后他前去赴约,并记载了会见孙中山的经过及印象:

至长洲驿下车,驱车至荒尾村访宫崎寅藏,会见清国流亡者孙文(逸仙)。孙去年九月拟于广州府举兵,事败遁走英国,为清国公使馆所囚,以国事犯流亡者之故,被英政府接纳,在其保护下生活,突然于今年九月渡来我国。改换姓名,曰中山樵。此次来熊与予面会,欲有所商量也。孙今年三十一岁,虽非大器,然才学兼优,豪迈果敢,有廓清天下之志。促膝谈论东方大事,直至鸡鸣。孙甚喜。^①

其中所言“去年九月”应为“前年九月”,可惜未详记彻夜“促膝谈论东方大事”的详细内容,只能根据“孙甚喜”的记载,大概表达了其愿意和上海维新志士联合的强烈意愿。不久,在宫崎、宗方的撮合下,1898年初,维新志士汪康年还专程赴日本与孙中山相晤,此事为清朝驻日公使侦知并传信回北京,还在北京官场内引发了一些争议^②。

至1898年,日本政界及报界均开始将孙中山称之为中国的“革命党”,这种共识的形成,应是孙中山在日本活动渐有影响的直接反映。2月3日,犬养毅致函陆实时,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都称为“广东革命党员”^③。2月21日,《东京朝日新闻》所载《清国革命党的首领》的报道,将孙中山称为“清国革命党的巨魁”^④。由此倒是可以印证陈少白的回忆具有可信的一面,即日本人最早将孙中山称为中国“革命党”,只是时间应该是在1898年前后,而非首次抵日的1895年。此后,日本报界普遍以“革命党”称呼和评价孙中山其人及其活动。

1898年3月,《日本人》杂志刊发了他们对中国政局的评判,其中佐藤宏的文章称孙中山是“通过革命性的手段改变国体”,“力图颠覆清廷推翻帝国,构建纯粹的共和国”^⑤。宫崎滔天更是将孙中山的 *Kidnapped in London* 一书翻译为日文,以《清国革命领袖幽囚录》(署名“滔天坊”)为标题,从1898年5月11日至7月16日在日本福冈玄洋社机关报《九州日报》上分期连载,其间还将标题修订为《清国革命党主领孙逸仙幽囚录》^⑥。这较之宫崎在1902年出版的《三十三年之梦》中追述他与孙中山见面与称呼,应当更加准确和符合事实。

巧合的是,中国的报界如《申报》也是从1898年开始将孙中山称为“革命党”。1898年1月10日,在评议国人反抗德国割占胶州湾事件时,《申报》称“年来革命之党愈聚愈多,其渠魁孙文于前年阴蓄异谋,暗购军火,幸事机败露,不致一发难收。今者孙逆虽海外潜踪,不复敢重归故土,而党中人迄未散去,依旧昌言惑众,虽虽欲仿行西政,实则其谋诡秘异常,甚且著成悖逆之书,令羽党四出散布,讥切朝政,狂吠猖獗”,最后预言“彼革命党之类,虽有阴谋秘计,亦徒自取覆亡”^⑦。由此可见,国内报刊已获知孙中山所著《伦敦蒙难记》等书。

1898年1月29日,《申报》在议论内患问题时,又称:“仆以为最足为害而又最未易除者,其惟革命之党乎。闻革命党以粤东逆犯孙文为首”,“在海外创为革命之说,刊布妖书,借口于新法之宜师,大言炎炎。”^⑧ 3月28日,《申报》在《瓜分中国辨》的评议中再次称:“方今革命之党秘谋渐露,势日鸱张,虽逆酋孙逸仙窜之远方,无计得归故国,而党中人安见无阴相煽诱潜蓄异谋者,一闻此种言狂,恐必谓他族既生

① [日]宗方小太郎著,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3页。

②③⑥ 桑兵主编,於梅舫、陈欣著:《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1,177,180页。

④ 《清国革命党的首领》,《东京朝日新闻》1898年2月21日,第7版。

⑤ 佐藤宏:《论解明支那朝野真相并改造该国是日本人的责任之理由》,《日本人》1898年3月号,第25页。

⑦ 《论胶人仇德事》,《申报》1898年1月10日,第1版。

⑧ 《防内患说》,《申报》1898年1月29日,第1版。

分割之心,我党安在不可先行发难,是萧墙之祸,实自此。”^①5月16日,关于湖北沙市民变一事,《申报》评论再次将会党与孙中山的“革命党”相联系,希望各省封疆大吏应以沙市民变为前车之鉴,称:“莫使此案未了,彼案又兴,以致哥老会、大刀会诸匪徒伺隙而动。而逆犯如孙文之类,更暗中勾结,致革命之党渐至滋蔓难图,则不特地方赖以乂安,而华洋交涉事宜亦不致多所棘手,岂非社稷人民之幸欤。”^②1898年《申报》有关“革命党”的四篇评论,大概出自一人之手,或论外患,或言内忧,均将孙中山与“革命党”对清朝的政治威胁相提并论,这也可以间接反映出孙中山虽在海外活动与宣传,在国内的影响倒是与日俱增。只是《申报》站在清朝的政治立场上,所言的“革命党”蕴含贬义,和造反者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报界从1898年开始以“革命党”称呼孙中山,可是孙中山在国内各界的政治形象并不统一:《国闻报》上论中国在野各党派时,曾借鉴西人观点以“维新党”目之,不久又刊载的《中山樵传》,则揭露孙中山在广东期间的所作所为,斥之为棍骗匪徒。总而言之,中国朝野上下有关孙中山的政治形象实际是一个多歧性的棱镜效应^③。

若单以“革命党”与孙中山的关系而论,从1897年至1903年间,孙中山的“革命党”形象和称呼,基本是以他者的指称出现。重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海内外报刊上的报道与评论,如《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④《申报》等;二是其他政治团体的称呼,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会及国内维新志士群体;三是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及章士钊的《大革命家孙逸仙》等传记。

孙中山在此期间虽然并没有直接自称“革命党”,但是在与日本政界及报界打交道时,基本接受了这个称呼。1902年,宫崎滔天撰写的《三十三年之梦》出版,以“革命党”及革命的叙述贯穿孙中山的活动生涯。孙中山对此表示认同,为之作序称:“宫崎寅藏君者,今之侠客也……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勗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⑤他愉快地将宫崎视为帮助中国革命事业的同道中人。这表明孙中山关于“革命党”身份的自觉逐渐形成。

二、保皇党与“革命党”

由于今人的思维观念与历史认识普遍将“革命党”与孙中山紧密纽结,几乎排斥了晚清中国“革命党”指称的多样性,尤其是处于孙中山对立面的保皇党。需要澄清的是,从1897年开始,日文及中文语境下称孙中山为“革命党”,可是“革命党”并不仅指向孙中山,还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这恰是厘清“革命党”自觉的关键历史层面。

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逃亡途中,即接受日本报界的访问。10月7日,《东京朝日新闻》刊载了康有为的谈话,在具体介绍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之前,描述康有为的神情状况,并称之为“革命党的巨魁”,因他是中国“改革党”的代表,与“守旧党”进行斗争^⑥。有关“革命党的巨魁”一说,这无疑和称呼孙中山并无二致。由此可知,这个时期日文语境的“革命党”存在较大模糊性,举凡与清廷“守旧党”抗争的党派,或者是在野的反对派,均可称之为“革命党”。

① 《瓜分中国辨》,《申报》1898年3月28日,第1版。

② 《沙市民变论》,《申报》1898年5月16日,第1版。

③ 参见安东强:《戊戌前后孙中山政治形象的棱镜效应》,《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3期。

④ 《读卖新闻》报道称:“革命党的巨魁孙逸仙在台湾,与对岸的同志遥相呼应。”见《孙逸仙在台湾》,《读卖新闻》1900年10月16日,第2版“杂报”。

⑤ [日]宫崎滔天著,林启彦译:《三十三年之梦》,第15页。

⑥ 《康有为的谈话》,《东京朝日新闻》1898年10月7日,第1版。

上述将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称为“革命党”的说法,并非偶然一例。即使到1903年的中文语境时,仍存在和保留了这种说法。当1903年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荣禄逝世之后,《申报》转载了日本报界评议荣禄的生平及事功,称其“中日交争时为总理衙门领袖,未几胶州湾事起,列邦要挟,时势岌岌可危,兼之革命党中人倡兴改政之说,朝野上下汹汹不安,公乃奉旨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总统武卫五军”^①。不难看出,此处所言的“革命党”是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其“改政之说”就是他们在京推动的维新变法运动。

因此,如果从“革命党”在晚清时期中、日两国的历史意涵及其指称的多样性出发,便可对1900年庚子前后孙中山、梁启超、唐才常、容闳等人的联合举动有新的认识。正因为日本政界和报界关于“革命党”的认识,才会积极推动孙中山一派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合作。这和后来历史叙事过早将保皇党与“革命党”一分为二、互为水火的认识迥然不同。

前辈学者关于庚子前后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梁启超及部分同门倡言革命的史事进行了信而有征的研究^②。孙中山关于变革清朝原有统治模式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的目标始终如一,只是手段上并不拘泥于纯粹暴力形式,因此他愿意与梁启超、江浙士人、容闳乃至刘学询等各方合作。1900年间,他说过:“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我并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视情况还有最终赴北京的打算。已离神户前往上海的梁启超,大概也是抱着类似的想法而成行的……依我看来,梁启超的决定回国,也是有鉴于此的。”^③他甚至为了争取刘学询的支持,主张:“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④这反映出孙中山实施革命策略的灵活性,也是功成不必在我的一种洒脱。

不过,梁启超及欧榭甲等康门弟子热衷言说“革命”,甚至与作为“革命党”的孙中山合作,确实对康有为主导的保皇会内部带来冲击,甚至分裂的风险。毋庸置疑,康有为是不愿意接受日本报界将他称为“革命党”的,对于孙中山从事反清的武装运动,更是不以为然。

1900年间,在保皇派谋划武力勤王期间,梁启超多次劝说康有为接受孙中山,称:“行者(指孙中山——引者注)之为人,虽无论如何如,若其用心此事,实娴熟过于我辈远甚也。彼本有才之人,而用功于此事者数年矣。而我辈今始入行,今日我辈骂行者前事,非恐我他日所行尚不及彼前事也。”还为孙中山反清辩护称:“我辈骂彼为叛逆,此二字岂可妄以加人哉?尧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曾何足怪。彼与皇上曾无恩义,而照各国人文明之公理例,驱逐满人,正我族之责也,何叛逆之可言?以此当知我辈之必与行者为难,实不免狭隘之消矣。”^⑤这正是梁启超愿意和孙中山联合的理由,一是若要武力举事,孙中山此前已有经验,“娴熟过于我辈”;二是从种族而言,孙中山行事完全照欧美各国“文明之公理例”,反清正是“我族之责”。

梁启超当时正醉心于国家主义学说和“革命”,所言也是真心,及其后一反前说,亦非虚伪。他后来并不讳言此事,称:“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

① 《译日报论荣仲华相国薨逝事》,《申报》1903年4月19日,第2版。

②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 孙中山:《与横滨某君的谈话》(1900年8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8—199页。

④ 孙中山:《致刘学询函》(1900年10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2页。

⑤ 《与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845—1846页。

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嫌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齏,持论稍变矣。”^①不过,他的“持论稍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此前学者根据《梁启超年谱长编》等文献,基本将梁启超不再言革命的时间定为1902年,即他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康有为发布反驳实行革命的言论之后。事实上则不然,这是因为《梁启超年谱长编》选编书函时有删节,梁启超于1903年赴美洲大陆游说华侨时,仍持“革命”之说。是年初抵美洲时,他致函徐勤论东京留学生闹事时称:“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②不久,又致函徐勤称自去年康有为严厉指责他言革事,连上两书表示悔改,其实“长者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即此次到美演说时,固未言革,然与惠伯、章轩谈及,犹不能不主此义也。舍是,则我辈日日在外劝捐,有何名目耶?”^③换言之,梁启超在赴美游历和演说时,仍秉持革命主义,更认为中国未来唯有革命可以解决。更重要的原因是,若不言革,如何劝说华侨捐款呢?

梁启超函中称他演说时不言革命,仅与同仁私下谈及,恐亦不然。恰在1903年12月,孙中山亦赴美活动,发现梁启超在美洲活动时“所用之术,不言保皇,乃言欲革命,名实乖舛,可为僂笑。惟彼辈头领,多施诈术以愚人,谓保皇不过借名,实亦革命,故深中康毒者多盲从之……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彼见风潮已动,亦满口革命,故金山之保皇党俨然革命党,且以此竞称于人前”^④。同月,他在给上海的中国教育会领导人黄宗仰的信中亦称:保皇党人“见今日革命风潮大盛,彼在此地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则竟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⑤。所言美国旧金山一埠“保皇党俨然革命党”及“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的情形,正是梁启超等人在美洲活动与演说的影响所在。

受此影响,孙中山从1903年开始将有关革命活动的重心,从注重行动一度转向政治论争和理论构建,推动了中国“革命党”的多维度自觉。

三、“革命党”的多维自觉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孙中山自言“革命”的时间,相较于他的那些后来被迫认为“革命行动”而言非常滞后,以致一些革命史的叙述中塑造出孙中山有一个从改良转向革命的阶段变化。就事实而言,孙中山早期确实更注重举事行动与计划的倾向,而不重视阐释和宣传“革命”及“革命党”的内涵与外延。这或许恰是晚清时期中国“革命党”从被指称到自认、多维自觉的一个历史进程。

1903年12月,孙中山与中国教育会领导人黄宗仰讨论了保皇会借“革命”之名宣传与敛财的恶果,“闻在金山各已检[敛]财百余万,此财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他也借此检讨海外华侨为何受骗,皆在“弟等同志向来专心致志于兴师一事,未暇谋及海外之运动”,接下来必须加强对海外的革命演说,“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同时他希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将新书新报寄往美洲及檀香山,“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⑥。孙中山自言是对过去数年“专心致志于兴师一事”调整方向,即指从注重举事行动转到宣讲方面,所以此次美国之

①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② 《与勉兄书》(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四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6册,第2613页。

③ 《与勉兄书》(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6册,第2626页。

④ 孙中山:《复某友人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9页。

⑤⑥ 孙中山:《复黄宗仰函》(1903年12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9,230页。

行自从抵达檀香山及旧金山后,集中力量演说中国革命的缘由与目标。

孙中山与黄宗仰的信函往来,反映出他开始重视与“在沪同志”的舆论互动,彼此互为声援。此前一年,他曾与赴日的章太炎讨论中国土地及建都问题,至此又与中国教育会领导人联络互动,这是推动中国“革命党”走向自觉的关键因素。

1903年是中国“革命”话语及“革命党”概念广泛传播的关键年份,其尤以东京、上海的联动为脉络。这一年的癸卯春节,中国留日学生群集留学生会馆,马君武等人登台发表排满演说,震动中外^①。《申报》也报道东京有“自称革命党中人就中华会馆开设大同学校,专以排满自由诸谬说”引诱学生^②。不久,章士钊在宫崎滔天所著日文版《三十三年之梦》的基础上,翻译和改编为中文版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传》在上海出版。该书开篇即称:“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③这不仅深化了国人关于孙中山的“革命党”政治形象,而且极有可能推动了孙中山本人公开接受“革命党”的政治角色。

1903年6月,由于《苏报》在上海推广传播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引发《苏报》案。此案爆发后,国内各报刊纷纷以“革命党”来报道此案,将邹容、章太炎均指认为“革命党”。以《初讯革命党》和《二讯革命党》为题报道上海租界审讯邹容、章太炎等人的情形^④。1912年12月时,章太炎曾称若论宣传革命之功,当不在孙中山之下,认为:“庚辛扰攘以来,言革命者有二途。软弱者与君主立宪相混,激烈者流入自由平等之谬谈,弟《驳康有为书》一出,始归纯粹。”^⑤这便是“革命党”的身份对“革命”观念影响的显例。

不过,时论并不关注“革命”观念是否归于纯粹。1903年7月5日,上海大报《新闻报》刊发了《论革命党》的评论,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与章太炎、邹容的革命党进行了政见差异的评析,称:“忽从自由民权之说,变而曰革命以流血牺牲为当尽之义务,若章炳麟、邹容、陈范诸人早已视性命如鸿毛,虽刀锯鼎镬而不惧,不得不壮其所为也。作《革命军》、序《革命军》、刊《革命军》,章、邹、陈三人欲革大清国之命者也,不认大清国者也。始而欲维新以救大清国,继而知大清国不可救,乃创革大清国之命之说,救之难,革之易,诸人未免始勇而终懦也。夫曰自由曰民权,此维新家之言;曰排满曰革命曰逆胡曰贼清,此不认大清国者之言。故大清国视为逆党,而维新家不敢引斯人为同类也。”创帝党、保皇党之说者,仍自居大清国之民,而将光绪皇帝斥为小丑、康熙皇帝及乾隆皇帝斥为民贼者,“革命党必欲以小丑民贼名之,无理狂悖,真不可思议者”。评论人并不理解革命党人的政治取向,认为:“天下将亡而朝政之腐败,官场之齷齪,凡有挽救大清国之心者,吾将闻其直切之言,发警钟于亚洲大陆也。若夫革命之说,虽以康梁尚不出此逆语,何有人以流血为志者,太无谓欤。”^⑥《新闻报》在政治立场上仍对“革命党”持保留态度,可是对“革命党”政治宗旨的解读有其洞见,将革命“排满”释为不认大清国而排满人。孙中山也明确指出:“我们说满清政府,而不说中国政府,这是有意识地这样说的。中国人现在并没有自己的政府,如果以‘中国政府’一名来指中国现在的政府,那么这种称法是错误的。”^⑦所言实质上是要将“大清”

① 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32页。

② 《学校宏开》,《申报》1903年2月14日,第2版。

③ 黄中黄:《大革命家孙逸仙》,上海“荡虏丛书”,1903年,第1页。

④ 《初讯革命党》,《申报》1903年7月16日,第3版;《二讯革命党》,《申报》1903年7月22日,第3版。

⑤ 章太炎:《与王揖唐》,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4页。

⑥ 《论革命党》,《新闻报》1903年7月5日,第1版。

⑦ 孙中山:《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年8月31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49页。

与“中国”有所区分。

中国报界对“革命党”的政治消极态度,很大原因还在于对“革命党”认知的模糊与多歧。此前革命史的叙述确实有一种线性的模式,关于1903年《苏报》案及《革命军》影响的叙述置于中国“革命”观念越来越清晰的线性演进脉络之下。若仅就事件本身而言,似无疑义,然而若从1903年国内“革命党”的认识与称呼混乱的事实出发,便可理解国内报界对“革命党”的保留。

问题在于,究竟何谓“革命党”?如果当时中国人已能明晰诸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为革命党,那么问题便会很简单。可是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国内一些触犯法律的案件,也会被冠以“革命党”之名。如1903年8月间江西九江发生当铺抢劫案,人犯拿获后,“经拷打后,有一名自供系曾国章,所属革命党中人,并又招有浙江某武员亦属该党”^①。换言之,国内外各类冲击清朝统治者的党众,如果都可称为“革命党”,那么孙中山等人领导的中国革命有何特殊性,如何能够成为中国革命潮流的引领者?

1903年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与上海知识界关于“革命”观念的传播和影响,确实引起了孙中山的关注。在《苏报》案之后,孙中山还询问黄宗仰:“上海同志近来境况、志气如何?东京留学又如何?闻陈梦坡已在横滨立一馆地,欲联络各处志士,此意甚美。”^②加之梁启超在美洲新大陆之行借“革命”之名敛财,也使得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对中国革命进行明晰的阐释,从而将他们的组织与保皇派及其他人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言“革命”者即为“革命党”吗?是否晚清时期触犯清朝统治秩序与法律者即为“革命党”?究竟何谓中国的“革命党”,这较之孙中山接受“革命党”的称呼,是更值得拓展与深化的“革命党”自觉问题。

正如《新闻报》在评论“革命党”时注意区分维新派(保皇派)与革命党人一样,孙中山在美洲演说的重点首先便是辨析“保后”与“革命”的差异:“革命与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具体差异在于:“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与任公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③他所要排斥的是保皇派“何必偏称革命”,从而完成“革命党”才有资格言“革命”和论述“革命”的统一性。

孙中山在自称“革命者”的同时,也提出谁不是“革命党”的问题。1903—1904年间,孙中山在海外掀起革命党人与保皇党人的论战,最主要就是指明“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因此“甚望华侨赞助革命党”,其“革命”是走向共和政体的“革命”,而不是保皇的“革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他还用另一种说法表达:“夫革命(者),破坏也;民主政体者,建设也。既明明于革命之先,定为民主政体矣。”^④他将中国的“革命党”与“革命”引向政体问题,而非仅言对象与形式,实际也是对康有为在1902年间发表政见的回应。

此前研究和历史叙述多着眼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政见的批判,反而较少细致梳理孙中山对康有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即1902年《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文合编之书)的回应。事实上,孙中山专门向美洲华侨声明,“此书乃康有为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图保皇立宪”^⑤,从而以康有为的政见驳斥梁启超等人借“革命”言保皇的论述逻辑。

除此之外,孙中山还对康有为讲法国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的看法以及中国人素有帝王思想的观点提出批评。因为康有为的观点称:“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吾见亦多矣。古今天

① 《自供党人》,《国民日报》1903年8月26日,第2版“中国警闻”。

② 孙中山:《复黄宗仰函》(1904年6月10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41页。

③⑤ 孙中山:《敬告同乡书》(1903年12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2,231页。

④ 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1903年12月13日)、《驳保皇报书》(1904年1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6、235页。

下,安得遇尧、舜、华盛顿?法国累更革命,积化百年,定章极严,而拿破仑第三犹如此,况中国向来本无议论,更无立宪定章。彼枭雄能指挥十八省者,其拥兵权何止五十万,如此则何为不可!夫华盛顿之时,美国人仅四百万,中国乃百倍之,其人之才能控制十八省四万万、破万里之全国者,非有秦政、刘邦、曹操、刘裕、朱元璋之枭雄术略,好杀自私,必不能也。”^①这表明康有为将中国革命及收拾乱局寄望于人,从而认为中国难以通过革命走向共和。

针对康有为的认识,孙中山将法国革命及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不同政治走向归结于“势”,而不是个人的作用,从而引出中国革命的制度程序设计。他承认“中国人具帝王之资格,即人怀帝王之思想”,这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潜在隐患,可是其恰恰从法国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不同政治走向的历史经验总结出一个革命路径:“夫拿破仑非不欲为民主也,其势不能不为皇帝,使华盛顿处之亦皇帝矣。华盛顿非不欲为民主也,其势不能不为民主,使拿破仑当之亦民主矣。”^②所以必须要造成革命共和之“势”。至于“势”的形成与约束,则依托制度设计,他称:

中国数十行省之大,欲囊括而恢复之,必有数统帅,各将大军数十百万,各据战地,鸣叱往来,即使诸统帅慕共和之治,让权于民,为其旧部者,人人推戴新皇,各建伟业,咸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陈桥之变所由来也。欲救其弊,莫若于军法、地方自治法间,缩以约法。军法者,军政府之法也。军事初起,所过境界人民,必以军法部署,积弱易振也。地方既下,且远战地,则以军政府约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则受军政府节制,无则由军政府简人任之,约以五年还地方完全自治,废军政府干涉。^③

这就是孙中山著名的革命程序论,首先披露于1904年初的上海《大陆报》之上。由前节所述他在1903年与上海同志之间的书信往来的史实,或许可以推测出:这些内容极有可能是他从美洲发往上海的信函中所述。因为目前1903—1904年间孙中山与上海革命党人的往来书信保留不多,故而留下谜团。

《大陆报》的编者对孙中山的观点作出极高的评价,认为:“今青年之士,自承为革命党者虽多,实则皆随风潮为转移,不过欲得革命名称以为夸耀侪辈,未必真有革命思想。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实行革命之规画者,舍孙文以外,殆不多见也。”^④这一方面批评了很多言“革命”的青年未必真懂何为“革命”,另一方面则指出孙中山对“革命”的阐释,不仅在于言论,而且有着一套革命程序和制度设计,这才能使他成为当时中国革命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或首领。《大陆报》的言论,也反映出国内同志在接受“革命党”认知层面的自觉:既有革命思想又有革命规划的才能称之为真正的“革命党”,其余人的称呼不过标榜而已。

1904年,在王宠惠的协助下,孙中山专门撰写了面向美国民众发表的以“革命”解决中国问题的文章,即 *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并在英文书名旁题写中文名为《革命潮》,以呼应邹容《革命军》的传播,此举是应麦克威廉斯(C. E. McWilliams)的要求。孙中山解释中文题名时说:“我以为用‘革命军’这一名称更为适合,所以我就写了‘革命潮’三个中国字,用作封面的题字。此三字在中国已公认为今日代表革命运动的意义。我想用这名称很妥当,不会引起此地居民的异议。”^⑤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⑥“成熟”之说,表明孙中山认识到海外与国内关于“革命”的认知逐渐

① 康有为:《答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77页。

②④ 《如是我闻·孙文之言》,《大陆报》第2年第9号,1904年10月28日。

③ 《如是我闻·孙文之言》,《大陆报》第2年第9号,1904年10月28日。桑兵最早注意到此篇重要文献。桑兵:《孙中山革命程序论的演变与评价》,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中山大学学报论丛·辛亥革命论文集》,1981年,第409—410页。

⑤ 孙中山:《复麦克威廉斯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8页。

⑥ 孙中山:《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年8月31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2页。

形成共识。

中国革命潮流的到来,并不意味着革命党人内部没有分歧。孙中山认为:“所有抱着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①孙中山对中国人群很擅长一分为三的分析模式,显然是将自己及同仁定为第三类,即“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也就是《大陆报》上所讲真有革命思想又有革命规划的人。

毋庸讳言,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党”及“革命”的创新因素来源于欧美政治及其历史经验。从1904年的“孙文之言”和《革命潮》,再到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机关报《民报》的发行,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党”应有入党宣誓仪式和“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理论自觉进一步系统化。

孙中山从兴中会时代便已参照政党及会党仪式,构建组织仪式。冯自由追述1903年东京军事训练班时称,孙中山已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1905年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亦沿用此誓词^②。孙中山则在《孙文学说》中追溯称:“吾人之立同盟会以担任革命也,先从事于鼓吹,而后集其有志于天下国家之任者,共立信誓,以实行三民主义为精神,以创立中华民国为目的。其不信仰此信条当众正式宣誓者,吾不承认其为革命党也。”^③

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所基于的正是欧美数百年来的政治进化,并论断近代以来的这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④。所以他也要将中国革命以“民”一以贯之:报曰《民报》,党曰民党,种族曰民族,政治曰民权、民主,经济曰民生^⑤。至于清朝也在派遣官员考察政治和预备立宪,他更是在欧美三权分立的学理论证与制度设计的基础上,融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因素,提出五权学说。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党”及“革命”意涵的论述实现了从概念、意识、仪式、制度、学理、主义等方面的系统论证,形成了以三民主义、五权学说为主体的中国革命话语体系^⑥。应该说,中国的“革命党”至此完成了多重维度的自觉。

在1906年12月2日《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连出狱之后到达东京主持《民报》的章太炎,在听完孙中山演说三民主义和五权学说之后,也觉得关于中国革命“目下言论渐已成熟,以后是实行的时代”^⑦。随着中国同盟会在国内系列起义活动的进行,国内朝野上下对“革命党”的政治形象,尤其是对清政府与“革命党”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另文详论)。

余 论

由于“汤武革命”的观念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的积淀和影响,当“革命党”在19世纪后期在中国、

① 孙中山:《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年8月31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3页。他后来在《孙文学说》中再次将中国人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这同样是一分为三的思维。

② 孙中山:《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1903年秋)、《中国同盟会盟书及联系暗号》(1905年7月30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4、276—277页。

③ 孙中山:《建国方略》(1917年至191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2页。

④ 孙文:《发刊词》,《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

⑤ 邓慕韩:《追随国父之回忆》,《三民主义半月刊》第10卷第3期,1947年4月15日。

⑥ 安东强:《中国“革命”意涵的古今之变》,《文博学刊》2025年第1期。

⑦ 民意:《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民报》第10号,1906年12月,第96页。

日本等东亚地区出现时,起初是一个具有贬义和负面的政治称呼。一方面,批评者担忧针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党”会使中国陷入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治乱局,乃至引起列强的瓜分;另一方面,批评者则担心“革命党”不能带领中国跳出王朝循环反复的传统“革命”意涵,即如何破除帝王思想。

在行动和身份两重维度上,孙中山皆首当其冲,成为最早被指为中国“革命党”的人。他从不使用“革命”及“革命党”,到后来接受外人的指称,便不得不思考与重新阐释中文“革命党”及“革命”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意涵,既要更改东亚世界关于“革命党”的政治观感,又要赋予“革命党”现代政治意义。1923年,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总结称:“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以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有立宪,亦革命之所赐也。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①若仅就晚清时期而言,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的政治意涵,既借鉴和保留了《易经》的“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思想,又从欧美历史经验总结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三大主义,还将中国制度文化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相融合提出五权学说,为中国“革命党”注入理论活力。

总而言之,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辛亥革命时期就为中国革命构建了一套话语、程序、学理和制度体系,希望用制度来约束人性,避免中国走向法国大革命式的悲剧或王朝循环往复的旧路,实现了中国“革命党”多维度的自觉和政治价值的超越,为中国革命在19世纪欧洲大革命和20世纪列宁的“世界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中奠定了自主自觉的底色。

Sun Yat-sen and the Multifaceted Awakening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in the Late Qing

An Dongqiang

Abstract: Both the concept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革命党 and the social group it denoted were entirely new phenomena in modern China. Initially, the term was used to describe foreign political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Its usage later shifted, first becoming a specific label for Sun Yat-sen, and eventually serving as a general pejorative for anyone violating the Qing dynasty’s political order and laws—including even the constitutional monarchists. In response to Liang Qichao’s 梁启超 influential overseas critiques of revolution and the evolving tide of revolution in China around 1903, Sun Yat-sen embraced this identity. He proceeded to systematically define and imbue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with its proper, multifaceted political connotations. Through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encompassing concepts, consciousness, rituals, institutions, scholarly theories, and doctrines, Sun completed a systematic justification across these domains. This process actualized the multidimensional self-consciousness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transcended the prevailing political values.

Keywords: Sun Yat-sen; Liang Qichao; Revolutionary Party; revolution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周吉梅】

^①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9—60页。